



科学走廊书系

THE MORAL ANIMAL

道德的动物

—— 我们为什么如此

【美】罗伯特·赖特 著

陈蓉霞 曾凡林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道德的动物

[美] 罗伯特·赖特 著
陈蓉霞 曾凡林 译

——我们为什么如此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的动物: 我们为什么如此 / (美) 赖特著; 陈蓉霞, 曾凡林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5
(科学走廊)

ISBN 7-5323-6394-5

I. 道... II. ①赖...②陈...③曾... III. 人类 - 进化 - 研究 IV. Q9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3360 号

Copyright © 1994 by Robert Wright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21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1

本书以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作品为脉络，从一些非常有趣的社会问题出发，逐步深入到人类进化的生物学基础。比如，人类的一夫一妻制不只是法律的规定，这种制度还有着深刻的生物进化的渊源。再如，同胞手足之间为了得到父母关爱而进行的竞争其根源在哪里？为什么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也会有所偏爱？自欺欺人的生物学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着详尽的分析。作者还总结了最新的心理学研究进展，从进化的角度审视了人类的情感、友谊和竞争、攻击等心理或行为，对人类基于基本的道德假定的日常行为及其动机进行了再思索。

对于包括达尔文在内的许多学者来说，谈论人类行为及其心理的进化本来就是一个要回避的问题，如果再把讨论拓展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上来，就更冒着遭受道德谴责的危险了。这本书正是作者独自跋涉在进化心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里的结果，他的发现实在有趣：人是动物，而且是道德的动物。

达尔文和我们

《物种起源》几乎没有提及人这一物种。由于《圣经》已说明了我们的起源，我们还为自己比纯粹的动物略胜一筹而感到自慰。但《物种起源》却对此种信念构成了威胁。因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上述事实毫不理会。在该书最后一章接近尾声的地方，他坦率地指出，通过研究进化，“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得到许多启示。”他还在同一段落中大胆地提出，“在遥远的将来，”心理学研究“将奠定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

遥远是对的。在1960年，《物种起源》出版101年后，历史学家约翰·格林(John C. Greene)评论说：“达尔文如果发现，对于人类所特有属性的来源的解释尚未超越他在《人类的由来》里提出的推测，他定然会大失所望。如果听到牛津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的J·S·维纳(J. S. Weiner)说这个课题是‘一个令人迷惑的主题，对此我们的进化观依然是贫乏的’，达尔文定会万分沮丧。……鉴于当今强调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继承性动物的独特性，达尔文也许会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回到前进化观的趋势，即强调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绝对的界限。”

在格林发表上述言论几年之后，一场革命开始了。在1963~1974年间，四位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Smith)——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它们完善和扩展了自然选择理论。这些观点从根本上使进化生物学家加深了对



绪 论



动物，包括我们自身社会行为的认识。

首先，这些新观点和我们这一物种的关系是模糊的。生物学家自信地讨论蚂蚁中自我牺牲行为的数学问题，鸟类求偶过程中的隐藏逻辑，但他们对人类行为的谈论则根本是猜测性的。即使是在综合和倡导这些观点的两本划时代的著作——E.O.威尔逊(E. O. Wilson)的书《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也很少提到人类。道金斯几乎是全神贯注于动物行为学课题，而威尔逊则将对人类这一物种的讨论放在最后一章，该章篇幅不大，且公认最富思辩色彩——在共有575页的全书中只占28页。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人类的关注愈益突出。一个人数不多但正在壮大的学者群体已经接受了威尔逊所谓的“新综合理论”(the new synthesis)的观点，并且将它们应用到社会科学，以便进行全面验证。这些学者将这种经改进的新达尔文学派理论应用到人类，然后用新收集的资料来检验这一应用。尽管不可避免会有失败，但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严阵以待的少数派(他们私下开玩笑时似乎有这种认同)，但其地位正在上升的迹象已很明显。人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中有声望的杂志正在发表这类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在10年前就投稿给对达尔文学派有所偏好的新崛起的杂志。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缓慢但确凿无疑地出现。

这里的“世界观”就是其字面的意思。如同量子物理学或者分子生物学，这种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理论，是一系列科学的理论和事实；但是又不像前两者，它还是一种对待日常生活的方法。一旦真正掌握(它要比另两个理论更容易掌握)，就能完全改变一个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

这种新观点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从世俗到精神以及日常



接触的每件事情：浪漫、爱情、性(男人和女人真的是被设计成一夫一妻制吗？什么环境可以使他们经常或不怎么愿意这样做)；友谊和仇恨(隐藏在官方、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问题其背后的进化逻辑是什么)；自私、自我牺牲、内疚感(为什么自然选择给予我们被称作良知的出发点的普遍内疚感，它真的是“道德”行为的指南吗)；社会地位和社会攀升(等级制度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吗)；男人和女人在诸如友谊和雄心等领域表现出的不同倾向(我们是自身性别的囚徒吗)；种族主义、排外恐惧(xenophobia)、战争(为什么我们会轻易地从我们同情的范围中排斥大批的人)；欺骗、自我欺骗和无意识心理(诚实是可能的吗)；各种心理疾病(抑郁症、神经质和偏执是“自然的”吗——如果是，它更有可能被接受吗)；同胞手足之间的爱-恨关系(为什么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爱)；父母对其孩子施加心理压力的巨大能力(他们关注的是谁的利益)；等等。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新达尔文学派的社会科学家正在与一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取统治地位的学说展开争论，这个观点与生物学没多大关系，它是指独特的、可塑的人类心理与独特的文化力量结合在一起，已经把我们的行为与其进化来源相分离；决不存在内在的人性来驾驭我们的行为，反而是我们的本性要受到驾驭。就像现代社会学之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本世纪初所写：人性“仅是不确定的东西，它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塑造和改变”。他还说，历史显示，即使像性嫉妒、父亲对孩子的爱和孩子对父亲的爱这样被深刻感受到的情感，也“远远不是人性内在的因



素”。以这种观点来看，心理器官基本上是被动的，它好比是一个盆地，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当地的文化习俗；心理器官不可能对文化的内容加以过多的限制。人类学家罗伯特·路易(Robert Lowie)在1917年写道，“心理学的原理不能解释文化现象，正如引力不能解释建筑风格一样。”甚至心理学家(人们也许期望他们能对人类心理进行辩护)也经常把心灵看成只不过是一块白板而已。在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倾向于做那些会受到奖励的事情，而不做那些会受到惩罚的事情；正是这种倾向赋予无形的心灵以特定的形式。在斯金纳(B. F. Skinner)1948年的乌托邦小说《沃尔顿二世》(Walden II)中所反映的是，通过一种严格的正强化和负强化社会制度，嫉妒、猜疑以及其他反社会冲动均得以被消除。

这种人性观，抹煞了某种东西或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被现代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称为“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学期间曾学过它，其中一些人在受其影响多年之后才对其提出质疑。当这种质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开始对其进行反驳。

在许多方面，这一切正好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ary)一书中描述的“范式改变”(paradigm shift)吻合。一群以年轻人为主的学者挑战他们前辈的既定世界观，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但仍锲而不舍地推进自己的观点，于是新观点得以盛行。然而，这种对于世代之间冲突的描述看似经典，但实际所发生的一切显然对其是一种讽刺。

首先，革命的发生并不引人注目。许多革命者强硬地拒绝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名称来称呼自己，因为这样做会轻易为自己竖起一面有可能带来麻烦的旗帜。它们曾经



有这样一个名字——“社会生物学”，这是威尔逊提出的贴切而有用的术语。可是，威尔逊的书惹了太多麻烦，激起太多恶意的政治图谋，以及对社会生物学本质的过分歪曲，以至于这个词被玷污了。他所属的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现在宁愿避开这一标志。尽管仍然信奉这一体系严谨的学说，但他们用了不同的名称：行为生态学家、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进化精神病学家。人们有时会问：社会生物学发生过什么事？答案是，它是在摧毁正统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诞生的。

这场革命的第二个讽刺之处与上述第一个讽刺密切相关。新观点中传统卫道者最不喜欢和害怕的许多特征，实际上并不是它的特色。从一开始，对社会生物学的攻击就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不是针对威尔逊的著作，而是针对曾被歪曲的达尔文学派的著作进行回击。毕竟，进化理论在人类事物的应用中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极不光彩的历史。在19、20世纪之交，进化论自从与政治哲学混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意识形态后，它就被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最无情的资本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它也酿成了一些关于行为的遗传基础的简单化观点——这些观点正好顺便助长了进化论在政治上的误用。于是，社会上就弥漫着这一气氛，即知识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残酷性，在许多学者和公众的心目中就是与达尔文主义理论牵扯在一起的（有些人认为进化论等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有关新达尔文主义范式的许多误解就产生了。



内在的统一性

例如：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在社会领域中经常被误用。大约在19、20世纪之交，人类学家们随意地谈论那些不具有完善道德的“低等种族”、“野蛮人”。对于不具备鉴别能力的观察者而言，这种态度轻而易举就能与进化论的框架相吻合，正如后来的人种优越论，包括希特勒的理论。但是今天的达尔文学派的人类学家在观察世界各地的人们时，较少关注文化之间的表面差异，而是更看重深层的统一性。在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仪式和习俗的大杂烩下，他们发现了在家庭、友谊、政治、求爱、道德结构中的相同模式。他们相信有关人类的进化设计可以解释这些模式：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在乎自己的社会地位（要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强烈）；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人们不仅闲聊，还闲聊相同的事情；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男人和女人在一些基本方面似乎是不同的；为什么各地的人们都能体验到内疚感，并且是在大致可以预料的环境中体验到它；为什么各地的人们都有一种深层的正义感，因此“善有善报”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公理就塑造了这个地球上各地人们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人性的重新发现居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一切让我们迷惑。我们对于生活中的这些基本要素熟视无睹，如赞赏、羞愧、悔恨、自豪、荣誉、惩罚、移情和爱等——正如我们对自己呼吸的空气、物体的下坠趋势，以及在这个地球上生命的其他常见特性都熟视无睹一样。但情况不必非是这个样子不可。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上述社会生活特征的地球上。我们可以生活在另一个地球上，在那里，人们的伦理观中有些具有上述的部分要素，而另一些则拥有其





他要素。但我们没有。达尔文学派的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的人观察得越是仔细，由人性结成的这张紧密而错综复杂的网就越是让他们感到震惊，而且对于这张网是如何编织的，他们知道得越来越多。

即使当新达尔文主义者聚焦于(人群之间或人群之内)的差异时，他们一般不倾向于根据遗传差异来解释它们。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将世界各地不可否认的多种文化看作是单一人性对广泛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的产物；不过与通常期待的相反，进化心理学家认同20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主要理论：早期社会环境有塑造成人心理的潜力；进化理论揭示了先前没有注意到的环境和文化之间的联结纽带(例如，解释为什么一些文化有嫁妆，而另一些没有)。实际上，有些人全神贯注于这个课题，决定去揭示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且相信他们只用达尔文主义的工具就能展开这一工作。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知道野心或不安全感是怎样被早期经验所调节，我们就必须首先探讨为什么自然选择使它们可以被调节。

这并不是说，人类行为就是无限可塑的。在跟踪环境影响的途径时，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都会碰到某些坚固的堤坝。斯金纳的乌托邦式行为主义风格，即认为一个人只要经过适当训练，就能成为任何一种类型的人，这在今天是行不通的。还有，下述两个观点，即人类行为中最邪恶的部分完全无法改变，它们深植于“本能”和“先天的动机”中；以及人们之间的心理学差异主要可归结为遗传差异；也不能成立。当然，它们可以归结为基因，(那么，统治心理发展的规律最终会在什么地方)但不必是基因中的差异。许多进化心理学家的一个指导性假设，出于许多理由，我们将会讨论，即人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最有可能在环境中有所迹可寻的那些差异。



在某种意义上，进化心理学家正试图寻找人性的第二个层次，即物种之间更深的统一性。首先，人类学家注意到各种文化中相同的主题：对社会赞许的渴求以及内疚感。可将这些以及其他这样的普遍特征看作是“人性的节点”。然而，心理学家指出对节点的准确调节似乎是因人而异的。某个人的“渴求赞许”节点设定在适宜的范围内，其自我安全感的阈值相对较低；而另一个人的节点则落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范围内，故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一个人的内疚节点设定得较低，而另一个人的节点则设定得难以忍受地高。所以，心理学家问：“这些节点是怎样设定的？”个体间的遗传差异肯定起作用，但是或许更大的作用是由遗传共性来发挥的：通过一种遗传的、物种层次的发育程序，从社会环境中吸取信息，并相应地调节心理的成熟。说来奇怪，在理解环境重要性的方面，未来的进步将可能来自于对基因的思考。

因此，人性以两种形式出现，这两者都有被忽略的倾向。形式之一表现为这种本性是如此普遍以至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如内疚感)。形式之二表现为这种本性的功能正是让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产生差异，因此，自然就掩饰了自身(一种调整内疚感的发育程序)。人性由节点(knobs)以及调整这些节点的机制组成，两者都以其特有的方式隐藏起来。

这种隐蔽性还有另一个来源，这是人性难以明朗化的另一个原因：各地的人们难以反省他们全都拥有一套根本相同的进化逻辑。自然选择似乎已经从我们意识到的自我中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见，我们会忘却我们最深层的动机——以一种比他所想象的还要慢和全面的方式(甚至有些情况下更加荒唐)加以忘却。



达尔文主义者的自助

尽管这本书涉及到很多行为科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政治科学，但进化心理学将处于其中心位置。这门年轻还不成熟的学科，以其尚不完善的前提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心理科学，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个在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而且在1959年，也不可能考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向普通人提供什么？

例如：一个理解人性的达尔文主义者能帮助人们在生活中达到目标吗？说实在的，它能帮助人们选择目标吗？能帮助他们区分实际的和非实际的目标吗？更复杂的是，它能帮助决定哪个目标是有价值的吗？也就是说，了解进化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基本道德冲动，能够帮助我们决定应当将哪一种冲动看成是合理的吗？

在我看来，答案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最后还是是的。前面这句话会让这个领域里的许多人恼火，如果不是痛恨的话（相信我，我已经将这个观点亮给其中一些人）。他们长期来不得不在达尔文主义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误用的阴影下工作，所以他们宁愿保持科学和价值领域的相互独立。他们说，你不能从自然选择或者任何自然规律中引伸出道德价值。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是在犯哲学家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从“是”中不合理地推理出“应当”。

我同意：自然界不是一个道德权威，我们也没有必要采纳似乎是隐藏在其规律中的任何“价值”。然而，对性的真正理解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深层的道德思想，我将通过合理的步骤证明这一点。

这本书，因与日常生活问题密切相关，将带有自助读物的一些特征。但它还很不完整。接下来的几百页也不会





充满精辟的建议和热心的保证。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不会使你的生活大大地简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会使生活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它将刺目的光线投射到在道德上我们不容易把握的行为上，并且进化已经方便地将这种难以把握性隐藏了起来。相比于它所要阐述的棘手问题、严肃的权衡、两难的处境和难猜的谜语，我从新达尔文主义的范式中能够搜集到的若干新颖而乐观的处方要更多。

但你不能否定这种阐述的强度——我希望你至少不要读到这本书的结尾还在否定这一点。尽管我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发现进化心理学的实际应用，但首要和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为了展示自然选择理论是多么精致，就像今天所理解的，它揭示了人类心理的轮廓。这本书首先是为一门新科学作广告，其次才是为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新基础作广告。

我已经在努力地保持这两个问题的互相独立，以便在新达尔文主义关于人类心理的观点和我自己关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实际传播的观点之间加以区别。但是我认为，几乎不会有人在接受了第一个系列的观点后还会拒绝与之相关的第二个系列观点。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新范式作为迄今为止最有力的透镜，我们通过它来考察人类物种，然而在考察人类的处境时却又将它弃之不用。人类物种就是人类的处境。

达尔文、斯迈尔斯和穆勒

《物种起源》不是1859年在英格兰出版的唯一具有重大影响的书。还有记者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写的最畅销和风格独特的《自助》。另外，还有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凑巧的是,这两本书很好地构建了达尔文的著作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自助》一书不突出宣扬这些内容,如时时关注自己的情感体验,摆脱令人乏味的关系,与和谐的宇宙力量交融等,或是许多其他的内容,那时的自助书中往往都充斥了这种强调自我关注和给人以肤浅慰藉的气息。该书宣扬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基本美德:礼貌、正直、勤奋、坚忍不拔,并且要恪守这些美德,严于律己。斯迈尔斯相信,一个人只要“通过锻炼他的自我行动和自我否定的能力,”就能几乎完成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任何时候都必须“抵制低级纵欲的诱惑”,而且必须“不用性行为玷污自己的身体,也不用奴性的思想衰读他的心灵。”

相反,《论自由》则强烈地反驳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坚持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的令人窒息的作法。穆勒谴责基督教对于“肉欲的恐惧感”,并且抱怨“‘你不该’过度地支配了‘你应该’”。他从加尔文教派的信念中尤其看到了一种扼杀人性的气息,“人性根本上就是堕落的,除非人性被扼杀,否则就不能得救。”穆勒对人性持一种乐观的看法,而且建议基督教也这样做。“如果相信人是被一个善的神所创造这一信念成为宗教的一个部分,那么,它就与这一信仰更为一致,即神赋予所有人以某些才能,人类也许可以培养和挖掘这些才能,而不应抑制或摧残它们,当人类正在一步步地趋近于他体内的理想概念,当人类在理解力、行动能力和欣赏能力上日趋增长时,神为此而感到欣喜。”

穆勒独到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天生就坏吗?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像塞缪尔·斯迈尔斯,倾向于道德保守——强调自我否定、禁欲、控制体内的兽性。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像穆勒,倾向于道德自由,完全放





宽人们对行为方式的选择。尽管进化心理学还年轻，但它已经使这场争论更趋于明朗化。它的发现立刻给人带来安慰同时也让人不安。

利他主义、同情、移情、爱、良知、正义感，所有这些东西，它们使社会具有凝聚力，并且使我们这个物种有理由自视甚高，现在则可以自信地认为它们都有一个坚实的遗传基础。这是个好消息。但也是个坏消息。这是因为尽管上述东西有益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但它们不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进化的，也不能被可靠地用于这一目的。相反：现在比过去更清楚的是，道德情感是怎样(和为什么精确地)出于不近情理的需要而被利用，出于自我利益而被遵守或放弃；以及我们怎样经常自然而然地忘记了这种变通。在新观点看来，人类是这样一个物种：它具有一系列精湛的道德说教，但却有一种可怕的误用它们的倾向，还有一种可怜的忽略这种误用的机制。这本书的题目不是完全没有讽刺意义的。

因此，因为社会生物学的流行观点强调“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也因为其真正意义上的重要性，故此，对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嘲笑的观点——堕落的人性观和“原罪”观，不值得做总结性的反驳。也因为同样的理由，我相信道德保守主义也不值得反驳。实际上，我相信，某些观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流行的保守规范中的某些观点，即使是间接的，其对人性的把握也要比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所流行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观点要更确切；而且，过去十年中复活的道德保守主义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性领域，有赖于对长期被否定的有关真实人性的一种确定无疑的再发现。

如果现代达尔文主义真有一些道德保守观的话，是否意味着它就有政治上的保守观？这是个既棘手又重要的问

题。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一种恶意的混淆而拒斥它，这是容易做到的，同时也是正确的。但是提出人类天生的善行问题却投下了一道政治阴影，它不能被随意地忽视，因为历史上在意识形态和人性观之间曾有过显著的联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政治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含义几乎已经发生了超越认识论意义上的改变，不过两者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依旧存在：政治上的自由（如穆勒在他那个时代）要比保守更倾向于持一种乐观的人性观，也更喜欢一种较为宽松的道德氛围。

还有，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否确实必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一点还不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当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具有合理的明显的政治含意时（作为一条一般规则，它恰恰不是这样），它们经常被等同于左派或是右派。在某些方面，它们根本上就等同于左派（尽管卡尔·马克思很不喜欢这种新范式，但他会发现它的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此外，这种新范式指出，一种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派别可能将某些道德保守主义学说描述成一种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东西。与此同时，它提出，一种保守的道德程序有时可以得益于自由的社会政治。



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达尔文

如果要大致描述达尔文学派的概况，我将以查尔斯·达尔文本人情况作为头号考察对象。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表现出进化心理学的原则。1876年，达尔文在其自传的第一段写道：“我试图这样描述自己，就当我是另一个世界上已作古的人，回头来看我自己的生活。”（他以一种绝对超然的态度补充道：“这样做我丝毫没有感到困难，因为生